

英华书院与近代早期来华伦敦会传教士的汉学研究

俞强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摘要：西方汉学研究是中西文化交流上重要的一个环节。到了十九世纪，从汉学的学术性转向看，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西方汉学经过学术性的规范和一整套方法体系的整合，更加体现出一种文化理解另一种文化的努力。以马礼逊为首的早期伦敦会来华传教士正是处于十九世纪初期这个西方汉学发生学术性转型的分水岭上。英华书院具有一个“东亚研究院”的性质，大量收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文献资料，翻译出版了许多研究中国的书籍和刊物，并且培养了很多在西方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汉学研究人才。

关键词：英华书院；西方汉学；伦敦会；传教士

西方汉学研究是中西文化交流上重要的一个环节。从十六世纪以来，西方殖民主义东来，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中国的物质文化风靡欧洲，营造出一个“中国热”的氛围。中国知识也在欧洲日渐膨胀，使孔子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成为西方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汉学也就由此产生了。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的西方汉学总体上说与基督教神学关系密切，欧洲本土的汉学家大多是业余学者和传教士。到了十八世纪，西方汉学研究有所改观，研究的问题也开始转向，比如中文语言的研究、中国历史纪年的研究、开封犹太人的研究等等，这些问题都从不同的角度，直接或间接地触及到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交流的研究。十九世纪汉学在欧洲形成一个学科，表明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进入到一个有系统方法、明确意图和理论背景支持的新阶段。在中西交往早期，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是模糊和随机的。在汉学学科的萌芽时期，即传教士时期，显然是一种不同于学术研究的认知阶段，但也有其明显的方法体系。到了十九世纪，从汉学的学术性转向看，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西方汉学经过学术性的规范和一整套方法体系的整合，更加体现出一种文化理解另一种文化的努力。这种努力不同于传教士时期，传教士们以认同中国文化为前提，是明确以他者的身份进行解读。这是十九世纪前后的两个阶段的重要差别。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汉学的开端，是1815年法国学者雷姆沙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这一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对中国研究正式迈入了西方学术的殿堂。于此而言，传教士所进行的中国研究不能称为“汉学”，至少与从雷姆沙开始的西方学术界进行的汉学研究属于不同的层次。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天主教耶稣会士，还是新教传教士，他们对中国语言与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探讨还处于比较浅显的层次，缺乏深湛的研究成果。但是，综观西方汉学的历史，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是从很浅显的研究着手的，并且大部分早期的汉学家都没有来过中国，他们的资料来源不得不大量依靠传教士提供的信息和资料，甚至参考传教士的研

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也可以说是近代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以马礼逊为首的早期伦敦会来华传教士正是处于十九世纪初期这个西方汉学发生学术性转型的分水岭上，他们为在中国传教做准备，十分重视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典籍；他们身处中国东南沿海，密切关注着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看到中国实际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我们在研究西方汉学的发展和演变进程时，这批新教传教士的研究活动，以及他们对传统汉学的继承和对近代汉学的开拓，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本文拟以英华书院为背景，探讨从马礼逊开始的早期伦敦会来华传教士从事的汉学研究的情况和他们对汉学发展所做的贡献。

英华书院是由第一位新教入华传教士——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牧师于 1818 年在马六甲创办的。该校 1818 年建成并开始招生。首任院长是米怜。及后，随着鸦片战争满清战败割地，香港岛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第七任院长理雅格于 1843 年 11 月将全校迁入香港，更名为“英华神学院”。直至 1856 年，终因人手不足和经费短缺之故而停办。英华书院可谓西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开基督教新教在华教育之先河。而且，她还具有一个“东亚研究院”的性质，大量收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文献资料，翻译出版了许多研究中国的书籍和刊物，并且培养了很多在西方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汉学研究人才。

英华书院的创始人马礼逊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研究，并且鼓励英华书院中的传教士从事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马礼逊就非常重视儒家经典，1811 年出版的 *Horae Sinicae* 一书，其中就囊括了《大学》、《中庸》等内容。在其编纂的《华英字典》中，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介绍就占有很大的篇幅，而且作了较为中肯的评价。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曾经担任过英华书院校长的理雅格认为：“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不是敌对的，虽然它的体系和思想受到东方社会和时代的局限，……不要使任何人以为了解儒家的书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在中国的传教士应该完全了解这些著作，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 [1] (P.114) 为此他主张在华传教士“直到透彻地掌握了中国人的经书，亲自考察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基础的整个思想领域，才能被认为是与自己所处地位和担任的职务相称。” [2] (p. 190)

英华书院是一个重要的汉学研究和汉学人才培养机构。马礼逊和米怜策划在马六甲开办英华学院时，就提出“造就欧人学习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字”，凡欧美教会教友、传教士、商行人或附有领事介绍者，均得申请入学。该学院建立之后，从事培养中文人才和收集中国有关的书籍。1820 年建成一幢三层楼的学院大楼，占地面积为 3060 平方英尺，底层图书馆，1823 年已有中文图书 2850 卷，博物馆藏有中国书画、地图、青铜器、瓷器等。马礼逊在 1831 年不无得意地说，“这是英国治域内唯一正规的教授中文的学校——即使在英格兰，也尚无教授中文的学校。”他宣称，英华书院的直接目的是沟通英国和采用汉字的国家的“文学上的联系”，而其最终目的是“把科学和福音之光”传播到亚洲。书院虽仅存 25 年，但她培养了一批粗通西学的华人和初通中文并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其中也不乏后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和西方汉学研究中发挥作用的人物。

当时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及中国文献的翻译。在这些研究领域里，英华书院的传教士研究也是成果丰硕，能够反映当时的学术水准的。

（一）在对中文语法和汉字的研究中，马礼逊的贡献是最大的。他首先于 1811 年完成了最早的关于中文语法的著作《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Chinese Language*），比马士曼的《中国言法》要早，但是直到 1815 年才由英印书院出版，印刷了 500 本。【3】（vol.3, p.238）马礼逊在前言中说到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向“学习中文的人提供实际的帮助”。马礼逊在书中对中文的特点作了简单的评论，对中国语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该书前面的部分介绍了中国的反切注音法和四声声调，和他所确定的汉字语音表，汉字的特点，214 个部首表，以及中国人编写的一些字典。其主要部分论述汉语的发音、名词、数字、形容词、数词和代词、副词、连词等的用法。末尾部分还介绍了中国方言、句法和音韵学。书中提供了说明中文语法的大量例句，均为中英对照。作为第一部系统论述中文语法的著作，在汉语语法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同时，马礼逊还完成了一本汉语口语对话教材，名为《中文对话与例句》（*Dialogue and Detached Sentenc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内容是一些日常的汉语会话，对初学汉语的外国人比较实用。1825 年，马礼逊回国休假，在伦敦出版了《汉语杂说》（*Chinese Miscellany: Consisting of Original Extracts from Chinese Authors in the Native Character with Translations and Philological Remarks*），在这本书中，马礼逊比较概括性地介绍了汉语的一般特点和他学习汉语中的一些心得体会。主要介绍了作为汉字生成规律的“六书”；金文、篆书、隶书构成汉字的“像形符号”；汉字的笔划；罗马字母的汉字注音法等。书中还附有显示汉字、汉语特征的 12 页图版。

还有长期在马六甲英华书院从事中文金属活字板印刷研究的戴耶尔对中文的构词法的见解也具有独到之处。戴耶尔曾为《中国从报》写过一篇题为《中文的语法结构》的文章。文中他首先反对了“中文没有语法”的观点，强调应当注意中文在构词法方面的特点。他认为很多中文词汇的词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使用过程中由其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词汇的相互关系来确定的。他对中文各类词汇，主要是名词和动词的构词法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他还具体考察了名词加上其他一些字后构成其性、数、格的规律。此外戴耶尔还就中文的语态、语气、时态、人称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4】（vol.8, pp.347-358）

英华书院对中文语法和汉字研究做出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印刷出版了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研究中国语法的手稿《中文札记》。马若瑟于 1698 年来中国，长期致力于中国语文的研究，《中文札记》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这部著作既不是简单的语法书，也不是一部修辞学的书籍，而是对汉语一项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可惜在他生前没有出版，其拉丁文手稿由人带回法国，一直保存在巴黎皇家图书馆。后来法国的雷慕沙写《中文语法》的时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据了这个稿本。后来有人抄录了一份，由英国的金斯伯罗子爵（Viscount Kingsborough）出资 1500 英镑，经马礼逊安排，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了其拉丁文本。【5】

(vol.2, p.58)1847 年, 裨治文的堂弟詹姆士·裨治文将其翻译成英文, 由《中国从报》社出版。〔4〕(vol.16, pp.266-277)

对中国语言文字研究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文字典的编撰。英华书院的传教士和学生也多着力于此。首先提到的仍然应该是马礼逊。马礼逊的《华英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的出版是西方中国语言研究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马礼逊编纂的《英华字典》从 1808 年到 1823 年分批出版, 共六大本, 4595 页。第一卷名为《字典》, 主要依据《康熙字典》确定其内容, 同时参考了《说文》《玉篇》《广韵》等中文工具书。在汉字的字数的确定和编排上, 完全按照《康熙字典》, 即按 214 个部首来排列的汉字。汉字的释义和例句, 也主要取自该字典。这一部分也可以看作是在翻译《康熙字典》的基础上完成的。马礼逊还在相关的汉字条目下, 就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方面的重要人物、制度、风俗习惯典籍得到那个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如对中国的姓氏、科举制度、孔子等都作了详细介绍, 从而为西方的读者提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第二卷名为《五车韵府》, 是因为他在编写的过程中以《五车韵府》这部中文著作为基础的, 是按汉字读音的字母顺序排列, 收录 12680 个中文汉字, 除了正文按照语音编排汉字以外, 为了方便读者使用, 还附录了一些附表, 如广州方言发音表、中文星宿名称表、列出了汉字的六种书体的对照表。第三卷名为《英汉字典》, 包括单词、词组、成语和句型的英汉对照, 解释详尽。这一部分以汉语解释英文词汇、短语, 同时也收录了一些中文的格言和习惯用法, 还在相应的条目下面介绍一些具体的知识, 如中国的纪年、度量衡等。〔6〕(p.99)除了这本《华英词典》之外, 马礼逊还编纂了一本广东方言字典《广东省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Conton Dialect)。这本书以帮助外国人掌握广东方言为目的, 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选出英文中的一些常用词, 按英文字母的顺序排列, 在每一个单词的后面用中文标出广州方言的译法, 并按照作者在他的语法书和词典中所使用的拼音系统, 加以注音, 在列举例句。第二部分则是将广州方言中的词汇和短语按照部首顺序排列, 然后再以英文释义。第三部分是附录, 作者选录了比较实用的中文词汇和短语, 在中国人助手的帮助下, 将这些词汇和短语分门别类地划分为 24 类, 这对那些需要与广东人打交道又没有时间学习广东话地外国人来说, 的确是一本很有用的工具书。马礼逊还编写了一部《汉语语言文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5 年在 Serampore 出版。不过这本书更应归类为教学课本, 并非真正总结语言规律的语法著作。它只是对于如何将常用英文译为汉语有帮助。〔7〕(p.348)

除马礼逊之外, 其他的传教士也编纂了各种各样的中文词典。其中麦都斯也是一个中文尤其是福建话的专家, 1837 年他编纂了《福建省土话词典》(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43 年在巴达维亚出版了《汉英词典》两卷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1844 年出版了《汉英对话、问答与例句》(Chinese Dialogues, questions and Familiar Sentences) 1848 年又出版了两卷本的《英汉词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还有戴耶尔也于 1838 年出版了《福建省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此外还有曾在英华书院学习后任林则徐英文译员的袁德辉也于 1826 年在马六甲出版了《英华学生口语手册（English and Chinese student's Assistant or Colloquial Phrases, Letters）》。英华书院还根据自己教学的需求，于 1841 年自己编印了一本教授中英和马来文的词典《英文—马来文—中文词典》（A Lexilogus of the English, Malay and Chinese Language）。

（二）在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中，新教传教士的研究著作所体现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与前人有所不同，尤其是与明清时期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以及“中国热”盛行时代的欧洲学者的观点截然不同，代表了近代以来新的时期西方对中国认识的一个侧面，虽然有些研究还是比较粗浅，只是一些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简单概述，但是也给西方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打开了一个窗口。最早来华的马礼逊在民俗学方面研究中国的儒学传统、社会风俗和民间宗教。诸如，儒家的拜天、天子、理、性、太极、易、卦、圣人、君子、贤人、德者、才者、善者等理论和观念，以及其他宗教的佛、菩萨、道、神仙、天后、喇嘛、清茶门教、茅山、挑筋教等信仰和主张。所以马礼逊在 1811 年出版的一本英文著作《Horae Sinicae》，其中就有《三字经》、《大学》、《三教源流》、《太上老君》等部分，而且在《印支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上也发表了这些方面的论著，引起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风俗的兴趣和认识。马礼逊的研究还涉及到中国的历史地理，根据克兰玛贝恩（J.L.Gramer Bynd）在《第一位英国汉学家斯当东与马礼逊牧师》（The First English Sinologists Sir George Staunton and the Reverend Robert Morrison）文后附录所开列出来的 1810—1892 年英语系统主要汉学论著中，有 1817 年马礼逊撰写的概述中国历史文化的著作《中国一瞥》（A View of China,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作者在书中表明，这是一本“中国历史、地理、政治、宗教和风俗习惯的概览”。该书的主要部分是中国历史的简介，对明清的历史，采用由近及远的方法排列，而上古到元的历史则改用按年代顺序叙述；对清朝的疆域、人口、政区、制度介绍的比较详细。在编制中国史年表的时候，马礼逊参考了朱熹的《通鉴纲目》和《二十一史》、《纲鉴会纂》、《历代纪年便览》等中国史书。该书内容简略，叙述扼要明了，比较清楚的向西方的读者提供中国历史的轮廓和清朝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这是英语系统第一本中国历史书，是当时西方世界认识中国历史的通典。马礼逊还利用回英国度假的机会，到各地社团和教会进行讲演，在讲演中论述中国孔子思想和中国文化，唤起民众对中国的向往；并会见那些著名的东方学学者，提供中国研究的资料 and 情报，鼓励他们的研究工作。马礼逊还在家中主办《中国杂志》（The Chinese Miscellany），开办“妇女中文研究班”，来提倡中国学术。

还有麦都斯于 1838 年出版的《中国：现状与未来》，这本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简略地叙述了中国的历史、人口、政治和法律制度、教育制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宗教文化等，旨在向读者综合性地介绍中国文明，描述清代中国的社会情况。第二部分则对新教在中国以及南洋地区的活动历史作了叙述。作者在第一部分中，将自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融会到对中国各个方面的叙述当中，特别是对关于中国的人口、科举制度、古代文明的叙述和评

论，都有其精到之处。米怜于 1820 年在马六甲出版了《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尽管书中主要介绍了新教在中国华南沿海和南洋一带的传教情况，但是也对中国的历史、人口、疆域和中国的宗教情况作了简要的描述。

英华书院出版的期刊也侧重于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英华书院在马六甲时期，主要出版了中文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英文的《印支搜闻》。《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历史上第一份中文期刊，主要面向华人，用来宣传基督教教义，还有少量的世俗内容，讲述西方的天文地理知识。而《印支搜闻》是来华新教传教士所创办的最早的英文期刊，由英华书院出版，主要撰稿人有马礼逊、米怜、麦都斯和英华书院其他传教士。其创刊宗旨是为了使传教士了解亚洲的各类消息，为他们相互沟通提供媒介。主要内容是关于印度—中国地区各国的哲学、宗教、神话、文学和历史的综合性介绍，主要来源是各种当地语言。《印支搜闻》中关于中国的内容，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关于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情况；二是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动态的报道；三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学术性研究。这些报道所涉及的内容极其丰富，包括清朝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动态、官员的任免、财政情况、军事动态、司法制度、社会治安、秘密会社、自然灾害、科举考试、中西关系、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道德水准、生活水平、宗教信仰等等，显然是要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印支搜闻》的读者对象是英国和欧洲的各界人士，东方英国殖民地的英国人还有各地的传教士。它在欧美的知识界与社会公众中间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所刊载的消息、资料、译文和评论，成为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英华书院于 1843 年搬迁到香港之后，创办了香港历史上的第一份新闻期刊《遐迩贯珍》。其中也介绍了很多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况，比如它曾连续报道了太平天国在广西兴起并迅速发展 to 南京的情况，还报道了广东红兵起义的情况。

（三）在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方面，英华书院的传教士更是成果累累，影响深远。伟烈亚力曾经编制过一份书目，列出 1867 年之前西方翻译出版中国书籍共 141 种。〔8〕其中有 25 种左右是 1850 年之后翻译出版的，在此之前出版的有 110 多种。这些译书大致可以分为中国经典、历史书籍和通俗文学几类。马礼逊于 1817 年在伦敦出版了《中国春神》（*Horae Sinicae*），这本书主要由 7 种译文构成，分别是《三字经》、《大学》，从《三教源流》中摘译的 3 篇关于佛教和道教的译文，一篇《劝戒食牛肉文》和一组译自一种通俗文丛的中文书信范本。除了马礼逊，英华书院的传教士也积极翻译中国典籍。主要有米怜于 1817 年在伦敦翻译出版了《圣谕广训》（*The Sacred Edict*）；科力于 1828 年在马六甲翻译了《四书》（*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s,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吉德于 1831 年翻译了《千字文》（*The Thousand-Character Classic*）作为英华书院年度报告的附录出版；还有麦都斯翻译了《千字文》（*The 1, 000 character Classic*）、《书经》（*The Shoo King, or The Historic Classic*）、《海岛逸志》（*The Chinaman Abroad: or a desultory account of the Malayan Archipelego, particularly of Java*）、《农政全书》（*Dissertation on the Silk—manufactur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ulberry)；英华书院的学生何进善也曾翻译了一本历史书籍《正德皇帝下江南》(Chingtih hwang Yu Kiangnan)。

下面主要讨论一位著名的传教士汉学家理雅格对中国经典的翻译。理雅格在 1850 年之前没有发表过任何翻译作品，却于 1861 至 1865 年之间将儒家最重要的 9 种经典翻译成英文。他的译本在很长时间里在西方是权威性的标准译本。理雅格在传教之余，对中国的四书五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希望能够把这些经典翻译成英文，加上注解。这是一个浩繁的工作，理雅格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尤其是中国人王韬的帮助。理雅格在一些传教士如湛约翰、合信以及中国人黄胜的帮助下，经过几年的辛劳翻译工作，终于在 1862 年先把《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译成了英文，在香港首次出版，合称《中国经典》一、二卷，中国的《四书》有一个完整的英译本，始于理雅格。当理雅格翻译《书经》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有如神助，大学者王韬来到香港襄助他翻译五经。王韬对于译书工作，经验丰富，在上海的时候就曾在墨海书馆从事翻译工作，这对理雅格来说，如虎添翼。1865 年，理雅格和王韬合译了《书经》出版，称为《中国经典》第三卷。1871 年他们合译的《诗经》也在香港出版，是为《中国经典》第四卷。1872 年，他们合译的《春秋左氏传》也作为《中国经典》第五卷出版。后来英文本的《易经》和《礼记》出版，分别称为《中国经典》的第六、七卷。当时，中国经典传诸西国，多是一些片断。零碎不全，而且译文常鄙俚不通，谬误层出。理雅格于王韬二人合作，花费 20 多年心血，系统完整地翻译中国的儒家经典，的确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壮举。《中国经典》共 28 卷之巨，采用英汉对照和详加注释。它使欧美人得以了解东方文明及中国文化之精髓，这是对中西文化交流和汉学的一个重大贡献。英国著名汉学家小翟理斯对此大加赞美：“五十余年来，使得英国读者皆能博览孔子经典者，吾人不能不感激理雅格氏不朽之作也。”

除了翻译中国的典籍外，传教士们还以撰写书评的方式来译介中国文献。如《印支搜闻》从第 5 号开始，连续刊登了米怜撰写的《中国文献》(Chinese Bibliography) 系列书评。作者选择了一些中国著作，简明扼要地评介其内容，从而比较系统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历史典籍。米怜先后撰写的有《明心宝鉴》、《圣谕广训》、《三字经》、《御制律历渊源》、《佩文韵府》和“四书五经”等。另外还发表了一些中国诗歌和文学作品的译文，以及探讨中国哲学和宗教的文章。

英华书院也给西方的汉学界培养了一些著名的汉学人才，如著名的汉学家吉德和理雅格，还有一个叫威廉·亨特的学生也是有名的“中国通”。马礼逊对汉学的发展工作也是很有远见的，他曾提议在英国设立一所中文图书馆和一所学院。并且主张牛津和剑桥两大学开设汉学讲座，虽未如愿，但马礼逊与 1834 年病逝时，将其全部中文藏书捐赠给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不过以接受曾在马六甲英华书院任教的吉德牧师 (Rev. Samuel Kidd) 出任大学学院的中文讲座五年为条件。1837 年大学学院接受了马礼逊的条件，吉德出任中文讲席直至 1843 年病逝为止。这是英国最早设立的汉学教授，在英国的汉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前文中提

到的翻译《中国经典》的理雅格，于 1873 年离开香港回到英国，继续进行中国儒家思想和典籍的研究。1876 年，他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讲座的第一任教授，一直任教到 1897 年。理雅格的主要著作有：《法显行传》、《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考》、《孔子——中国的圣贤》、《孟子——中国的哲学家》、《中国文学中的爱情故事与小说》、《致缪勒有关中国人称帝与上帝》、《中国编年史》、《离骚及其作者》、《帝国儒学讲稿四篇》、《封建的中国》、《道德经》、《道教论》、《中国的诗》、《中国古代文明》、《基督教与儒教之比较》、《孔子生平及其学说》、《孟子生平及其学术》等等。〔9〕(p.136)，理雅格在牛津大学前后任教 22 年，培养除了不少优秀的汉学家。

英华书院毕业的学生威廉·亨特于 1825 年来华，初在美国一家公司作学徒。后转至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中文，1826 年返回广州，1829 年加入美商旗昌洋行，1837 年成为该行的合伙人。1844 年返回美国。后来又回到广州、澳门、香港活动了 20 多年，1891 年在法国尼斯去世。1882 年，威廉·亨特在巴黎出版了《广州番鬼录》(The Fankwae at Canton)，叙述了 1825 年——1844 年外国人在广州的情形。1886 年，他又写出了《旧中国杂记》(Bits of old China)，着重记载他眼中的鸦片战争前广州的情形。作者在书中对于当时岭南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中外关系都作了相当生动的描绘。作者还记载了与外国商人直接打交道的行商、买办和通事等人，描绘了他们与外国人交往、做生意的情况。作者还十分关注广州下层社会百姓的生活，描绘了卖唱的、变戏法的、小贩、游民和乞丐等众生相。这些描述是了解鸦片战争前外国人在华活动的重要资料。

综上所述，以马礼逊为首的英华书院传教士正是处于十九世纪初期这个西方汉学发生学术性转型，从具有神学背景的古老汉学向呈现社会科学特征的近代汉学交融转化的转折点上，他们一方面身处中国东南沿海，密切关注着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看到中国实际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初来中国的传教士，还受到传统汉学的神学背景的影响，十分重视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典籍，为他们在华传教做准备。因此，他们所从事的汉学研究也正在发生分化，有的坚守以前的汉学传统，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和典籍的研究，有的则更多的倾向与向近代汉学研究转型，注意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和记录中国当时发生的现势变化。我们在研究西方汉学的发展和演变进程时，这批新教传教士的研究活动，以及他们对传统汉学的继承和对近代汉学的开拓，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他们的研究成果和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中国观深深地影响其后来者和近代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

参考文献:

- [1]【加拿大】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79
- [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3]【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译本），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 [4]Chinese Repository, Canton, Macao&Hongkong
- [5]【英】Morrison Eliza A.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1839
- [6]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7]【法】贝罗贝.二十世纪以前欧洲汉语语法教学研究状况[J]，中国语文，1998,(5)
- [8]【英】Wylie Alexander,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1867
- [9]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